

# 《永乐南藏》谁知意？悲喜交错四百年

## ——跨越时空的佛经典藏迁徙之旅

□ 姜松延

在吉林省图书馆，藏有一部《永乐南藏》，作为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，在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据记载，刻于明初的这部藏经已存世不多，国内现有收藏约十部，其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套馆藏珍品，来源竟是相距2000公里之遥的我市通州区兴仁镇。为解开经书的来历谜团，由馆长张勇、党委书记吴爱英带领的吉林省图书馆一行五人，于今年7月南下江苏，先后赴南通、苏州、南京等地寻访。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在通座谈与实地走访，继经史料搜集与考析，大致还原出这部藏经的迁徙史及其背后的悲喜故事。

### 《永乐南藏》刻经缘起

史载明代刻印官版大藏经有三部。洪武时期，明太祖召集各地佛教学者于南京点校《大藏经》，并命人刊刻，此即《洪武南藏》，又名《初刻南藏》。因《初刻南藏》刻成不久就遭焚毁，明成祖又于永乐年间两次敕刊，先后重刻于南京、北京，为便于区分，通常分别称作《永乐南藏》《永乐北藏》。

《永乐南藏》付梓后，其经板藏于南京大报恩寺，并开放供民间自由请印，故该藏经流传甚广，对弘法、宣传佛学的影响也最大。

自明永乐十八年(1420)《永乐南藏》雕成，到清康熙年间，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全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，是全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。

吉林省图书馆所藏《永乐南藏》，其经书“莲花台施经愿文牌”正中有墨题“海门县正堂政和黄奎壁恭请”，说明该藏为黄奎壁等海门人士请印。黄奎壁，明万历二十六至四十一年海门知县。清《顺治海门县志》以其富有政绩而列入

传：“黄奎壁，字聚垣，闽之政和人，以明经知海门县事。风神清爽，才猷敏练，礼士得民，全以儒术修饬吏事。精堪輿，故多兴建，实有裨于民生。”足见黄为人慷慨爽直，有才干智谋且敏捷干练，堪称勤政爱民的好知县。再查阅相关史料，并结合该藏经所显示的有关信息，当年能成功请印这部《永乐南藏》的原因，亦可基本明了。

一是佛教兴盛，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，曾命礼部广泛搜集遗书善本，刻印刊行，还下令不得征收书籍税，使得当时的刻书风气极为兴盛。加之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，洪武时期佛经的刻印传播因此而甚为流行。永乐年间，又因明成祖崇信佛教，佛经刻印规模更大。即政策环境的相对宽裕、帝王对佛教的推崇，以及官方数次主持刊刻《大藏经》，推动了佛教印经事业的繁荣及佛教经籍的广为流通。

二是刻印佛经，是僧众弘法途径。

自古以来，僧人肩负着隆绍佛种、续佛慧命的重要使命。历史上官刻大藏经供自由请印的只有《永乐南藏》，于是，各地前来请印、迎请者纷纷，其中也包括海门僧众。从经书上施经愿文牌与“韦陀护法图”间文字，可知该藏经由“崔柏、顾霏、吴一俊、金如茂、方演文、昙华院住持法寿”等人“登大报恩寺”后才得以印造。

吉林省图书馆另藏历年《检晒经单》，则提供了更多当年赴宁印制《永乐南藏》的细节。

如道光六年记“大明万历丁巳年间，开山功德主、诰封中书成公字实置诸同事并住持法寿和尚等，留京数载，请工印刷，共置藏经六橱，计八千六百四十一卷，分为三百七十八匣”。邑绅成宇实及昙华院住持法寿等人，数年致力于此，体现了他们阐扬圣教的初心本怀。而僧人募化刻印经书，既有研读经义、依教奉行之用，又有讲经说法传教之需。故海门僧众来此印经，与其大力弘扬佛法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施经愿文牌左下方文字显示，这部《永

乐南藏》由“南京聚宝门外徐小岗印造”。大报恩是明代最著名的皇家寺院，因前来请经的信士众多，以致明初南京聚宝门(今中华门)内外印刷《永乐南藏》的经坊、经铺生意相当火爆。日本学者曾有研究，在《永乐南藏》中留下名字的坊铺近20家，徐小岗印造行是其中之一。

三是为积功德，有信众提供赞助。佛经的印制，其资金多为募化而来。赞助者除了积累功德，还有消除业障、往生极乐等愿望。从施经愿文牌右下“浙江慈溪县信士方日新助银刊”可知，海门所请藏经，由慈溪信士方日新出资助印。而“天”字版左下方除刻有“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信士方日新捐资敬刊大藏经像板一副”外，还有一段文字：“祈保父亲方轸、母亲冯氏，现生之内，五福齐臻，他保之中，二严俱备，四恩总报，三有均资，见相皈依，咸登觉地。”透过简短的发愿文，便可窥见出资者助印佛经的真实内心态度。而文末“万历庚戌年立”，为该藏经的印装时间，即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。

### 兴仁武庙藏经由来

至于海门僧众请印于明万历年间的这部藏经，之所以后来又出现在兴仁，就得从海门迁县说起了。

滚滚江水自上游带来大量泥沙，从而在入海口出现东洲、布洲二沙，史称东布洲。五代后周显德五年(958)，海门县始置于此。但自元末到明初中叶，长江入海主流移向北支，引起北岸崩坍，海门县治曾四迁。至清康熙十一年(1672)，海门县治又迁于江，百姓除溺死逃亡外，余民迁永安镇。是年，海门裁县为乡，归并通州，称海门乡(后改名静海乡)。继因“永安又复临江，至康熙五十八年(按：即1719年)，邑人杨锦文等吁请州守马公置驿徐润渡田迁居，聚处是名兴仁镇”，又称“新地”。

据民初《南通县乡土志》“兴仁乡”载，“杨锦文，字质甫，诸生也，海门县既废，居永安镇者户口仅十之三，徙去治南二十四里，在今三圩镇、小海镇之间。时尚近江，锦文乃售其产，与史鸿业择徐润

渡田百二十亩，率邑人居焉，即今之兴仁镇也”。

“海门旧地兴仁镇，一瞬沧桑几变迁。涨了新沙还坍了，幸无租税剩书田。”这首竹枝词，是对迁居中的海门人耕读并重、重视精神传承的描写，并注有“惟兴仁镇业儒者为多”。的确，历经迁徙的海门人在重新定居后，不仅努力解决衣食需求，重视物质生活环境的建设，而且特别重视精神家园的重建。即在为当时及后代作稻粱谋的同时，能不忘“作修身齐家谋，作书香传承谋，作续历史、传承祖先文化之谋”。为此，除了保留乡学，编纂乡志，不忘家风家训及乡间良俗嘉德等，古海门人还迁建或新建寺庙于新居。如随其屡次迁徙而建于今通州区境内的寺庙就有很多。其中，《静海乡志》所记兴仁镇附近有众多寺观来自海门：“广惠寺在兴仁镇东六里，西禅寺在兴仁镇东十余里……准提庵在兴仁镇南三里，双林庵在兴仁镇南四里，九华庵

在镇场东三里，俱新建。”而镇上的寺庙亦多由当年的海门人迁来或新建，其中，仅《静海乡志》记载的就有文昌宫、节孝祠、麻公祠、城隍庙、关帝庙、三义阁、五印庵等。

根据该《永乐南藏》晒经记载，这部经书当时藏于兴仁武庙。武庙，即关帝庙，以拜祀武圣关公而得名。查《道光壬辰续志新图》，兴仁镇时有关帝庙三座，一是位于城隍庙(后建成今兴仁菜市场)正北、运盐河南岸、徐润桥西南侧的大关帝庙，二是在城隍庙正前方的小关帝庙，三是位于镇南的关王庙。本文述及的《永乐南藏》，原先就藏在其中的大关帝庙。对于大、小关帝庙，当地百姓更习惯以方位称之为北关帝庙、南关帝庙。

对照康熙《通州志》曾记永安镇有“关帝庙、西禅寺，并有藏经楼。城隍庙、三官殿、白衣庵。以上俱从海门县迁永安镇”。兴仁武庙的迁徙路线图似乎更为清晰了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该藏经应系随古海门人及武庙迁徙而被带到兴仁，并设武庙奉

藏。果然，这一推理在《静海乡志》中得到印证：“关帝庙在兴仁镇，庙存藏经共七百五十函。万历四十一年僧法寿印造，有江都王纳谏碑记。”而吉林省图书馆馆藏1920年夏历六月兴仁武庙《逐日晒经功德簿》之《检晒经单》也有类似记载：

本镇北武庙，旧海门县因坍迁来之古刹也，其碑字曰昙花院，于故明万历三十八年间，经开山庙主、邑绅成伟宇实公等暨昙花院主法寿师，在京恭请御制藏经八千六百四十一卷，为安镇地方计也。

以上记录，不仅确认了兴仁武庙与《永乐南藏》均由海门迁来的史实，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，如北武庙是一处佛道合一的宗教场所，开山庙主为成宇实，原佛寺就以昙花院为名，由此对该藏经经文均钤有“昙花院记”阳刻朱文方印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再查王纳谏，字圣俞，号观涛，江都人，晚明学者。明万历三十五年(1607)进士，官至吏部员外郎。惜当年碑记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### 藏经晒经民国有迹

晒经是保护经书的一种重要手段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，是我国佛教传统的晒经日，也称“晒经节”“翻经节”。寺院的僧人会在这一天把经书拿出室外晾晒，以免蠹虫蛀蚀。吉林省图书馆所藏《永乐南藏》从万历三十八年请印后，自乾隆五十年始，至民国三十三年止，有记录的晒经共有九次。

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，以民国时期的两次晒经记录最为丰富。民国九年(1920)的晒经为其中的第八次。此次晒经，为“六月初一日焚香启钥”，“于二十二日告止”。而捐资主晒者是陆维熊、成煥、张荫谷、王守诚、陈淦、蒋荟森，俱为当地知名人士。张荫谷，字席亭，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举人，曾发起创办兴仁小学，1907年，受张警委派，到上海江苏教育总会设立的法政讲习所学习。1909年任省咨议局议员，先后任兴化县民政长(1912)、县知事(1913)。蒋荟森，字韵芳，1908年任南通县议会议员。1911年，兴仁自治议会成立，张任副议长。后为江苏县议员联合会会员，1928年出任兴仁区行政局局长(即

区长)。成煥系前述明代万历年间开山庙主成宇实的六世孙。王守诚为兴仁籍学者王焕德之父，1913年当选兴仁自治议会议长，时与陆维熊(1914年任兴仁乡区自治董事会总董)等同为北武庙庙董。陈淦则为兴仁警区董事。

此次晒经结束后，地方报纸曾有报道：“新地武庙晒经，……已于(阴历六月)十八日晒完，现正举行落成大会。一切费用，皆出自各善男信女慨助，未尝劝募一文，诸办事人亦十分热心，始终不懈云。”

据1920年《检晒经单》，兴仁武庙有“木橱六，每橱设抽屉六十三，每屉封誌经书二十卷，安厝大殿帝座左右，由该院主僧世代保管”。除此以外，当年的《检晒经单》还记录了清末民初兴仁武庙的变迁：同治十二年第七次晒经后，“庙运代替，僧徒远窜，主院无人。清末促办地方自治，将院改建自治局，旋更名办事处。民国肇造，庙宇半改学校，僧侣寥寥。”

据范子愚记，上述所谓庙运主要指“宣统间，西偏佛殿毁于火，惟大殿独存，

然僧徒则以无所栖止而散去”。庆幸的是，“民国建元以还，院址屡为政教所改用，藏经仍封存无恙”。

时隔24年后，这批藏经再次被晾晒，组织晒经的是当地知名信士蒋奂若。

蒋奂若，出生于兴仁西街的一户商人家庭，据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推算，其生年为1900年。综合历年旧报报道，蒋奂若早年毕业于上海远东大学；1928年9月，在结束江苏省农矿厅合作社指导员养成所的学业后被留厅服务；1931年3月，任观仁区农会指导员；抗战胜利后，担任吕四区区长，经多次请辞，于1946年6月获准；同年返里，任兴仁镇合作社理事主席；后于1947年8月受聘担任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。

蒋奂若心怀慈悲，热心慈善公益事业。如1927年曾为兴仁育婴局“捐资购买牛乳，逐日补助饲哺，……未尝懈怠。婴孩体格，亦多壮健，较昔之支离羸弱，迥然有别。”

对于这次晒经，蒋奂若有专文记述：自南通沦陷后，“地方遭逢兵祸，刹宇荒颓，人事兴废，谁遑过问。癸未(按：即1943年)

秋月，奂若经其处，见经橱抽屉外露，询诸邻右，始悉橱门他移已久。因思若长此以往，经籍散佚，在所难免。凡我佛弟子，岂能视若罔睹，私心忧戚，遂怀整理之愿，拟迁置镇南佛教居士林，装制橱门，曝晒供养，以重法宝。”次年5月，蒋商得兴仁居士林林长陈志才、镇长王炯然赞同，于初八日柬邀该镇各界人士集议通过，并经呈报备案后(时任伪南通特别区公署署长张萃如之批复现藏吉林省图书馆)开始了第九次晒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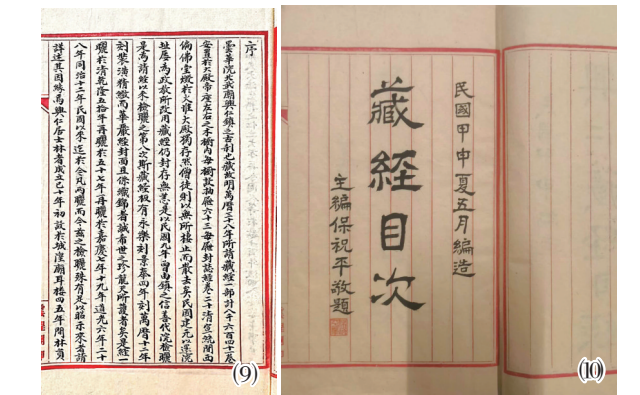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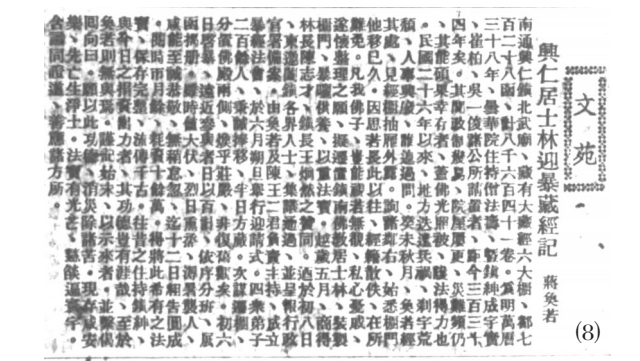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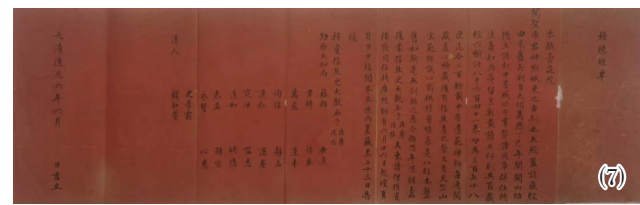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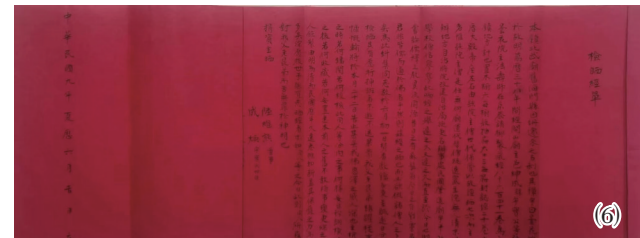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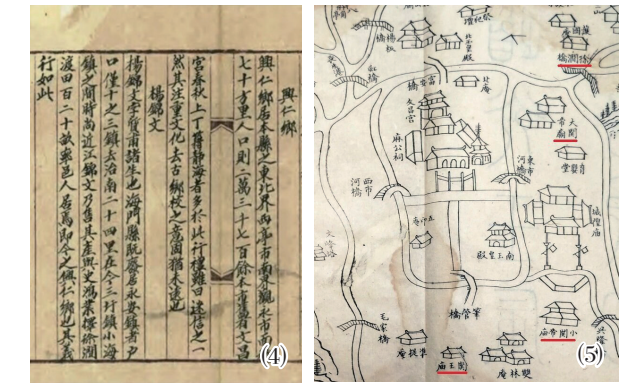
据记载，这次晒经等活动由蒋奂若与陈志才林长、王炯然镇长三人主持。他们首先举行了募经法会，于六月初一行迎请式，“四众弟子二百余人，虔诚捧移”，半天完成。随后考虑迁橱，分别置于佛殿两侧。晒经则依照传统，于“初六日启暴”。参与晒经者远近皆有，“日以数百(人)计，依序分班，展函揭册。”当时正值大伏天，“烈日熏蒸，溽暑袭人”，但所有参与晒经者“咸能至诚恭敬，无稍怠忽”。晒经到“十二日粗告圆成”，前后历时“月余，耗资十余万。”而“得将此稀有之宝法保存完整，流传千古”，则令蒋奂若等信士感到欣慰。

知了。

据张勇馆长介绍，因1954年吉林省会迁至长春，新的省图书馆于1958年建成，1960年正式开馆。为丰富新馆藏，该馆曾派员到全国各地旧书店及民间大量选购古籍文献，苏州是其主要收购地。而当年的入库记录显示，吉图于1961年从苏州购进这部藏经，总价是7500元。

自明代初期至今，从长江之滨到北国春城，这部写满悲喜故事、不失传奇色彩的《永乐南藏》漂泊路，自然不是本篇所能记述尽的。虽仅能揭示历史的一角，但愿能由此引起有关专家的关注，并达成寻根究底之愿望。吉林省图书馆对这部藏经也非常重视，还为此申报了省级课题，且已组织力量，开展研究，相信他们的努力会收获新的成果。

对此，我们都热切期待着！



上图：(1)现藏于吉林省图书馆的该藏经部分经书、经匣，(2)“莲花台施经愿文牌”和“韦陀护法图”，(3)吉林省图书馆馆藏《永乐南藏》晒经单，(4)《南通县乡土志》之词条“杨锦文”，(5)道光壬辰(1832)兴仁地图中的三座关帝庙及徐润桥，(6)1920年检晒经单，(7)道光六年(1826)检晒经单，(8)蒋奂若《兴仁居士林迎暴藏经记》刊于《弘化月刊》1945年第49期)，(9)范曾之父范子愚为1944年晒经录像作序，(10)1944年保祝平主编之《藏经目次》，(11)吉林省图书馆领导专家在兴仁镇(后排右起5、6为馆长张勇、党委书记吴爱英，前中为陈治尧老人)。本版有关藏经图片由吉林省图书馆提供。